



可以看作是政治富有活力的标志？

二) 如果非要为北宋的灭亡找一个责任人，为什么不是指使他们变法或废法的神宗或太皇太后？

三) 把历史图解成清浊忠佞的路线斗争，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败坏我们的历史观的了，它除了阻挠我们对历史成因及其机制进行有效的探讨外，我看不出它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关于他们二人的关系，在熙宁三年（1070）二人围绕变法的书信往来中已有清晰的论断。司马光在《与介甫书》中说：“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也提到：“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赵宋王朝的创世纪源于太祖赵匡胤在陈桥的“以武犯禁”，提防出现新的“以武犯禁”遂成为有宋一朝制度设计的轴心。他们对军队一方面推行统（兵权）调（兵权）分离，另一方面又用制度性贿赂换取政治野心的上交，只要军人们一心贪图享受，政府宁愿把他们包养得白胖如猪，精致如孔雀。赵宋王朝的光荣与耻辱皆衍生于此。它首先决定了赵宋虽然坐拥历史上最繁荣的商业和最庞大的军队，却始终无法摆脱后周以来“积贫积弱”的困局；决定了它无论对辽、金还是西夏，都宁肯割地赔款，亦不肯拼死一战；决定了它步步败退以至偏安江南。

正因为宋朝的文化自信不能建立在阔大的疆域之上，所以才转向政治开明和文教建设，逼仄的地理空间反而孕育出雍容华贵的政治文化气象。如果换一个朝代背景，想必应该是这样的：神

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时，天下咸与变法；太皇太后否定变法时，天下全是拥护“（元祐）更化”的呼声。但在神宗（整个宋朝皆如此）一朝，王安石变法时，反对的旧党后浪推前浪，一浪

刚被贬滴出京（其实是强制下野），下一浪又来了，直到满朝只剩下新党才算了事；“元祐更化”后，那些被贬滴的旧党人士全部复职，新党则尽数退出。这里颇有些责任内阁的意思，变法的成废关键在于权力的最高主宰者，但他既不能让变法的反对者支持变法，也不能让变法的支持者在失去权力后换一副嘴脸，继续赖在权力的殿堂（例外当然总是有的，像王安石多有倚重的吕惠卿）。这里尽管有党同伐异之嫌，但又似乎与利益无关，那些旧党人士很难说是在变法中利益受损的既得利益集团，新党成员也并非都想着到改革里大捞一笔。仁宗时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不被采纳，他就撂挑子出京，仁宗也不治他的罪；司马光因政见与王安石不合，也可以换个地方继续写他的《资治通鉴》。王与司马这亦敌亦友的充满张力的关系结构乃至整个党争的结构也只能存在于宋朝这种文化空间中，并成为它曾经存在过的证据。（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